

目 录

艰苦的历程·····	张治中 (1)
------------	---------

第四节 进军校

一、武昌·····	(1)
二、保定·····	(7)

第五节 锻炼

一、投奔广东·····	(10)
二、多次遇险·····	(15)
三、宣汉事变·····	(19)
四、在上海大学·····	(25)
五、初试教学·····	(26)

忆张冲同志·····	桂 灿 (30)
------------	----------

江阴要塞起义的前前后后·····	唐君照 (66)
------------------	----------

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郑朝强 (80)
-------------------	----------

齐鲁大学校史简介·····	王神荫 (106)
---------------	-----------

遣送东北日侨俘的回忆·····	李修业 (147)
-----------------	-----------

“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罪恶史·····	神原秀夫等 (167)
--------------------	-------------

日军在东北的细菌杀人罪行·····	韩 蔚 (182)
-------------------	-----------

“井上公馆”和“特务机关”的内幕·····	朱声昌 (193)
-----------------------	-----------

质疑·补充·订正

对《蒋军赣州守城战役亲历记》的补正·····	黄 维 (226)
------------------------	-----------

艰苦的历程

张 治 中

第四节 进军校

一、武 昌

陆军部入伍生团并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宣布之后，我们从南京被送到保定。不料一到保定，就听说有人反对合并。反对的理由：第一，因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升学系统，是招考高小毕业生入陆军小学，三年毕业升入陆军中学，两年毕业，再入伍半年以后始能升入陆军军官学校。这就是说，必须经过高小的六年，陆小的三年，陆中的两年，一共十一年，才能进到军官学校。年限是这样的长，经历是这样的久，从他们的眼光中看来，南京入伍生团是不合这个资格的。第二，现在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学生，在光复时多有参加革命及指挥军事的官长，入伍生团的连排长许多是他们充任。现在硬要使师生同学，未免不合情理。第三，就是依照前清陆军升学系统，他们是正统派，而入伍生团是半路出家。由于这几种原因，反对合并的声浪很高；而这一个反响，遭遇了我们入伍生团同学激烈的抗争。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学中

显然地分为两派：一派是主张非力争不可的，另一派是不主张家力争的。这时北京政府决定分设两个陆军军官预备学校：第一校在北京清河，第二校在武昌南湖。第一校收容陆小毕业或陆中肄业的陆军学生；第二校收容南京入伍生团的学生。我们可以加入的，就是这——一个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我是属于不主张家力争的一派。因为感到我们的科学知识太不够了。这一个预备学校是注重科学教育的。我们正可借这机会，充实科学的基础。所以我不主张家力争。可是我有一个矛盾：同学中都知道我平常喜欢写作，到了开会抗争的时候，要我起草呈文。我居然接受他们的意见，尽管我不赞成他们的主张。我还是替他们起草，而且写出很多的理由。大家都说我写的呈文是“理直气壮”。但这一个问题终于未得北京政府的许可。于是我们又从保定回到武昌，进入北京政府就前清陆军第二中学的原址成立的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

入校是一九一二年冬季。一共修学两年。在这个学校的两年中间，我认为自己确实得到了不少的进益。它的课程，在对科学的学习上，因为我过去没有根底，所以一开始学习就感觉莫大的兴趣，也非常用功。不过究竟不是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学上来的。一个还没有受过高小科学教育的学生，一跃跨入高级中学的行列，虽然凭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可以赶得上，但毕竟是很吃力的。譬如说，当时对于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我都觉得很有兴趣，很吃力地学，但总弄不大清楚。我记得：常常为一个数学题，总是尽量运用脑筋去想：白天想不通，晚上想，睡着还想，走路，吃饭甚至做梦也还在想，真未免太吃力了。至于其他的功课，如史地、理化、代数等，就觉着容易了。另外有一门功课——图画，使我简直没有办法。记得有一位先生教我们的图画，

有一天，是考画什么东西吧，我随便画了两笔，表示这两笔就是一座巍巍的喜马拉雅山，山上画了一个很高的纪念碑，也是随便的两笔，而且题了一行大字：“大中华民国战胜纪念碑”。是这样幼稚得可笑。意思就是在表示登上喜马拉雅高峰、雄视欧亚的气魄，就这样地交卷了。先生看了，笑一笑，打一个圈，给我吃了一个“鸭蛋”。还有一门功课——论理学（逻辑），必须机械地记公式。我自信是一个记忆力很强的人，但我没有办法把自己机械化。在考这一门功课时，理论是可以对付的。而对于那种复杂的公式，实在是没有方法去对付，于是只好坦白地交白卷。教这门功课的先生是一位四川人，他却不把“鸭蛋”送给我，而奇突地批了三个大字：“好极了！”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他的用意：是在赞许我的率真（不知即不知），还是讥讽我的无能呢？

还有一门功课使我感着兴趣的，就是德文。以前在扬州曾经学习英语，现在我想进了军校，学习陆军，最好是学德文，因为那时德国的陆军在世界上是驰名的。在这里，我从字母学起。本来我是一个语言笨拙的人，但因先生的教授法好，缺乏语言天才的我，在德文班里，成绩居然得以排在甲级，而我的时间花在德文学习上的可也就不少。回想到这一门课程，使我永远怀仰着一位先生，就是当时教授我们德文的格拉塞先生。

不客气地说，当时我们的先生、官长，似乎很多都是平平常常的。只有一位先生被我看得起，影响我最大，那就是教德文的德籍教师格拉塞先生。在这整整两年的授课期间，他没有耽误一次课。没有早退一次堂。他的家离学校有好几里，每天都是走来走去，下了课回去吃饭，吃了饭又来上课。尤其在夏天，走得满头满身热汗淋漓，跨进学校的大门，就往课堂上去，毫不休息，

他的授课，是切切实实的。教授法非常好。他经常穿一套简朴的黄卡叽布制服。一到礼拜天，我们喜欢到他家里去。他的夫人是日本籍。他们欢迎我们同学到他家里，很亲切很客气地招待我们。他给我们的印象实在很深。他认真，负责，态度诚恳，刻苦耐劳，处处表现着不愧为人师表的风度和精神。学问好，教授法好，还在其次，他拿人格影响学生，所以学生所得到的，不光是他的学问，而且是他的人格。他那时不过四十一二岁吧。他不是传教师，也没有其他什么任务，他是一个德国高级师范毕业生，清末受聘到武昌高等学校教课，可以说完全是一位教育家。到一九一四年我国对德宣战，他本来要被遣走的，因为他在各校教课，师生的感情都好，就把他留住了，这是特殊的待遇。我离开南湖后，和这一位最可亲敬的先生隔别了许多年，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到武昌才见面。后来我到德国去，他还介绍他的儿子照应我。一九二九年，格拉塞先生六十大庆，我正任武汉行营主任，曾赠送酒席，并亲自到他家里拜寿。此后也偶尔通过信。抗战后，听说他死于武昌。在我的师长中，他是使我最难忘的一位。

如果说我生平有最难忘的一位朋友，那就是当时的同学郭孔彰。他本是北京师范大学堂的学生，国文、科学，都有根底。为人正直豪爽，真是一个悲歌慷慨的热血青年。我开始认识他是在上海学生军里，一见如故。以后在武昌同学，他给我的益处最多，他予我的影响最大。我们在一块的时候，总是讲求志气，研究学问，都要做一个大人物，充满着英雄主义的思想。我们对于同学的态度也是严肃，看见贪玩不用功的顽皮同学，认为没有志气，不稍假以好的辞色，不和他们来往。那时候，我们常在一起的

几个同学，被一般同学称为“三圣七贤”。有些同学就常常揶揄我们，念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我们只好付之一笑，并不去同他们争论。

郭孔彰在光复前就参加了京津同盟会，他是一个极富国家民族思想的热血青年，真情朋友。我们以后从保定毕业，两人被分发到两个地方：我到安徽，他去北京。听说他到了北京军队以后，常常引吭高歌，满腔义愤，此时他对于国家前途及个人身世，更加怀抱了无限苍凉悲壮之感。不久督军团造反时，我们在上海遇着了。那时候，我决心南下赴粤，追随护法运动。他要同我一齐去，被我劝阻了。我的理由是：我们两人何必都到广东，而且到广东以后，在事业的开展上，不一定就有把握。孔彰是四川人，四川这样大这样重要的地方，他回去，不患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我和他约定分途奋斗，并且狂妄地说：“各人去打天下，无论那一个有了成就，将来再会合来干一番事业，岂不最好！”由于这一个理由，他勉强地同意了。从上海分手后，他回到四川当营长，打仗，不幸阵亡于遂宁。孰料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人才，竟死于悲惨的内战，真是极尽人间的惋惜与哀痛！假使他和我一同到广东，以他的学问，人格，抱负，一定可以成就一个最有为的人物，何致一战而死。我懊悔极了，我悲痛极了！

郭孔彰死后三年，我到四川，哭奠故人的坟墓；再过二十年，我重去四川，复为之修墓立碑，并撰了一篇纪念碑文，以志哀思。他是我永远不能忘的一个真挚朋友，一个忠肝义胆可亲可爱的热血男儿。

我真庆幸，我有这样一位良师（格拉塞先生）和这样一位益友（郭孔彰）的辅导。在这两年中，由于良师益友人格的感召和学

间的切磋，影响我实在不小。我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每天，每礼拜，自己有功课表——自习表，什么时间自修什么功课，什么时间写日记，都一丝不乱。我尤其喜欢读古人或名人的关于修养方面的书，如《王阳明集》、《曾文正公家书》、《群学肄言》、《菜根谈》、《自助论》等书，都喜欢看；此外如发明家、思想家的传记，《宋儒学案》、《中国历代名臣言行录》、《饮冰室文集》等等，也都一一涉猎过。在这一个时期，我沉醉在修养的功夫上，我看这些书，非常有兴趣。我的日记，写出了当时对人生理解的轮廓，可惜后来我从安武军出走，一个皮箱装着很多的书和我的日记，托一个同学保管，不幸被遗失了。

我的兴趣集中在求学上，读书上，不但不到汉口去玩，连武昌也很少去过，除非有必要的事而不得不去。我引为遗憾的有一件事：一次，我的父亲从家乡到武昌南湖来看我，刚好礼拜天放假出去了。父亲等我回校，匆匆一面，天已晚了，父亲想就在校旁的小饭铺里借宿一宵，以便和我谈谈。我因小饭铺并不是旅馆，没有床位，催父亲回去，同父亲就在黄昏时黯然地分别了。他走到武昌渡江，住在汉口一个朋友家里。临别时，我说预备第二天请假到汉口看父亲，到第二天我又没有去。一直到父亲回了丰乐河写信告诉我，才知道父亲住在汉口朋友家，大热大烧，病了两三天，扶病回安徽的。这一个烙印，真成了我毕生的遗憾！

在南湖两年的学校生活，以我从前的遭遇比较起来，可以说是登了天堂。衣服，不用说是由学校发的；每餐四菜一汤。想起流浪时代，一顿饭，一样寡油寡盐水汤汤的青菜，买几片咸萝卜就算很好，相隔何啻天壤。但是在那个时候，校中的津贴很少，每月只有二元，买一些信纸、袜子、面巾、肥皂、牙粉和书籍、邮票、

文具等还不敷用，自然没有钱买揩汗的小手巾。照例，学校每礼拜发擦枪布一次，这擦枪布是大约八寸见方的一块土布，质料很粗，我就把它当小手巾用。一天上操，我拿出来揩汗，一个同学看见了，失声而笑。官长说他犯了规，把他叫过来处罚了。那时是罚跑步。或举枪立正。这个同学虽受处分，始终没有讲出所以笑的原因，而在我的心中却认为是一件有趣的事。

在这两年中，我安分守己，严正不苟，虽有些地方不免幼稚得可笑；然而彻里彻外是一个纯洁的、肯用功的，有志气的青年，对于人生的修养，科学的知识，国家大事的见解，都树立了一个相当的基础。

二、保 定

在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后，分发到保定入伍。我是分发到第八师，时期是一九一四年冬季。什么叫“入伍”呢？入伍就是学习当兵。连上的官长都是行伍出身的。按规定我们应该同兵士一样，和兵士在一块生活；可是这些官长，对于我们这几个新来的学生兵很客气，给我们一间单独的房子住，而且单独吃饭。我记得那时候和我同住一连的有两个入伍生——徐培根、罗纬。一个见习官——刘永祚。连上的官长，也不管我们，我们也落得他们不管，每天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正好多看些书，有时偶尔也上上操。这样入伍期间六个月，很自然地，很平顺地度过去了。可是在这期间里有一个最大的不幸：我的父母相继去世。为着奔丧，来回耽擱了一个多月。因为父母去世，无限悲伤，有一段期间最难过，心情沉痛。

完成入伍的一段过程，升入正式的陆军军官学校，必须经过

一个入学检定考试。验身体、考科学，都很顺利地通过了。这样进校以后，我第一件事，便是专心一志地读书，研究军事学。我一向是很能用功读书的，进了军校以后，特别抓住了这一个机会，加紧读书。肄业期间，两个暑假都没有回家，利用暑期，遍阅军事参考图籍。譬如，一部《阵中要务令详解》十厚本。以及《作战纲要详解》七本，都读完了。同时还着重身体的锻炼和人格的修养。每当礼拜天或放假日，就和几个同学，带几个烧饼，一个水壶，到野外的松柏林间游憩。保定郊外的风景线，可以说是一座坟堆，一座松柏林。我们就在树林间，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谈的尽是关于一个人的志气、抱负，目空一切，趾高气扬，自命不凡。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学似乎是可以区别为两种典型：一种同学是喜欢看戏，吃小馆子，甚至于涉足花丛。尤其到了礼拜六，这些同学，组织观剧团，有时戏园的老板还亲自跑到学校来请他们点戏。也有少数同学，每逢礼拜天，溜到城里的会馆，把衣服一换，“打茶围”去了。另一种同学则不然，平时用功读书，研究学术，在礼拜天或例假日，便到野外散步，游玩，吃些瓜子花生，纵横谈论。我是属于后一种的。我和几个比较接近的同学，从来就没有想到闲逛，看戏，脑筋里根本没有那些玩耍的观念。反而对于那些喜欢玩耍的同学，抱着鄙薄的态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实在不免有许多幼稚的地方，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尽管是谈抱负，论志气，然而怎样才叫做爱国，怎样去实现自己的志气与抱负来爱国，可以说在当时的意识里是极其朦胧的，并没有一个确定的中心思想，充其量，只是一个个人形态的英雄主义在那里发酵罢了。

在这一个时期，遇着一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那就是袁世

凯想做皇帝，一个荒谬绝伦的“洪宪之梦”。因为这一件突然发生的大事，引起了我们全体同学的愤怒的狂潮。袁世凯是在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下令称帝的，三十一日下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大颁爵赏。这一个帝制的迷梦，这一个天大的笑话，刺激了我们这般的青年军人的心，大家非常地愤激，都感觉无比惊奇：“怎么忽然做起皇帝来了！”那时候，全北京的报纸，在袁氏控制压迫之下，有的是袁氏御用的机关报，不是歌功颂德，就是噤若寒蝉。只有一家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日本派在中国的一个间谍机构）——不接受袁政府的管制，公开地反对帝制，因此我们学校当局禁止学生去看。我们学生最喜欢看这个反对做皇帝的报纸。有一天，一个同学正在偷看《顺天时报》，被学校的一个官长看见，报告了校长。校长一方面痛切地感到平时禁止之无效，一方面为示威起见，派卫士把那个同学，抓到校本部，痛打四十军棍。这位大校长，姓王名汝贤。好！你闹出祸事来了！“啊！那还了得！”全体同学的公愤，烧成一道通红的火炬，闹起来了。大叫大喊，把砌阶的砖翻出来，打窗子，打校本部，军官学校变成了暴动大本营。压制已久的愤怒，一下迸发出来了。我们还把校长的像片撕毁，扔到厕所里，而且尽情地辱骂校长。为着正义，为着同情，我们简直是疯了！这位校长，到了实在无法收拾的地步，一不做，二不休，请调驻军，如临大敌地包围了学校，并把我们的讲堂，把我们连上的枪枝都收缴了。

现在回想这一次的暴动，可以说是一幕趣剧。因为我们这位大校长，实在可以成为笑话的主人公。他是非常低能的，不会说话，也不会办事，只因与袁世凯有私人关系，才被派来做校长，

我们一般同学平时就很轻视他。他是利用这四十军棍来示威，同学们又何尝不想借这四十军棍来泄愤？一个主持教育的人，一定是要一个有学问、有能力、有品格而能为人师表的人。这样才可以教学生，才可以担负教育的责任。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在全体官长和先生中，最佩服的只有一位，就是步兵科长程长发——程其祥先生。他品格好，野外演习的讲评好，一般同学很佩服他，尊敬他，有什么问题，经他一讲，同学就没有什么意见。其余如炮兵科长，因其身长，同学就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做“长加隆”，辎重兵科长是一个矮子，绰号就叫“白炮”——这些官长，都不被学生重视。我们又可以知道，一位师长，如果他的品格、学问、能力，不能得到学生的信仰，单靠学校的纪律是无济于事的。所以选择一个学校的负责者或教育者，一定要注意到他是不是可以为人师表。一个军事学校全靠军事纪律是绝对不够的。

我在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求学前后整整五年，培植了我的科学基础，培植了我的军事学术基础，培植了我的人格修养基础，对于我一生的事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第五节 锻 炼

一、投奔广东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我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年终毕业的前夕，学校分发志愿书，叫我们填报。那时候，我很希望到边疆去服务，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到边疆，第二志愿是到当时的各师，但是结果把我分发到安徽去了。一揭晓，出于我的意料之

外，也许因为我是安徽人吧。于是，我们四十余人都被硬派到安武军^①去见习。我们都不愿意去，就推我做代表，到北京向陆军训练总监请愿。那时训练总监是张绍曾。我到了北京，跑到训练总监部，没有见到张绍曾，部里的一个职员出来会我，我代表同学的公意，请求另行分发，但是他给我一个失望的回答：“不可以！”我们的要求被否决了，希望成了泡影。没有办法，只得带着快快的心情回来。我们满腔热血，想到边疆去奋斗，平时胀满了一肚皮的英雄主义，更想打出一条光明大道，但是终究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仍然必须回到腐败的、旧式的、由倪嗣冲统率的安武军里面去，这真是最大的烦闷。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回家一次，扫了墓，很抑郁地到安武军报到。

我被分发到驻在蒙城的一个小镇的一个哨上。哨，是袭用旧式巡防营的老名称，等于现在的连。我是以一个见习官的资格来的。这里的哨官、哨长（即现在的连、排长），都是老粗，象这样的军队，当然说不上教育和训练，不过有时叫我们为士兵上上课，或是为了防剿土匪，侦察地形，叫我们画一个图，做一个警戒配备的计划。他们觉得我们年纪都很轻，在讲堂上所讲的，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我们所做的计划，又是他们见所未见的，所以对我们非常客气。

见习期间，自己看看书，野外散散步，日子也容易过去。有一个不能忘的印象，即亲眼看见旧式军队的腐败情形——他们的官长，每天赌钱，打麻将，吃过饭就上牌场了，把桌子一拖，哨官哨长坐下来，就好象上课，恬不为怪地赌博。我们当然不愿同流合污，有时站在他们后面“观战”，也不好表示什么不满的态

^① 安武军，北洋军阀倪嗣冲的军队。

度。至于哨官的野蛮，那更是无法形容，有时将头目、哨兵拖到地下，一阵军棍乱打，打得头破血流。我亲眼看见一个头目被打得屁股上、大腿上一块肉一块肉地飞，那种狂叫、惨痛的呼声，使人心惊胆战。也不知为的什么事，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理由。不但一边恶打，还一边痛骂，连祖宗八代都骂出来。叫人打，打不够，就自己拿军棍来打，有时把军棍都打断了。有时气忿上来，手里拿着大刀挥舞，硬象就要杀人的样子。象这一类的凶横、野蛮、粗暴，我们新从学校出来的青年，真是想也想不到。我们在保定军校里，为着一个同学挨了四十军棍，就闹出一场天翻地复的风潮，哪里知道，打屁股，挨军棍，在安武军中，简直是家常便饭。当然，这一种落伍的军队，是注定了淘汰的命运。我从前听见有人讲过巡防营、绿营的腐败情形，说是把“马搭子”——北方一种睡椅似的卧具——向操场一端，官长就躺在上面看操。我虽没有看到这一类怪现象，然而我在这里——安武军——却看到了更多的怪现象。

在这一个腐败的军队里混了两三个月，忽然督军团造反了。这是一九一七年的事。督军团为什么造反呢？经过情形大概是这样：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帝制失败，羞愤而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次年，段主张对德国宣战，黎不赞成；五月七日段祺瑞提出宣战案于国会，两院都不赞成，他的左右嗾使督军张勋等请黎总统解散国会，黎乃下令免段职，督军团大哗，纷纷独立，推举张勋率兵北上，直逼京师。这位倪嗣冲，自然是督军团要角之一，当然也统率了他的腐败的烂队伍北上，还誓师哩！这时候，我的不安与苦闷交相逼迫而来。本来预备见习六个月期满，另外去找一条正当的出路，哪里想到，还没

有期满，就遇着所谓督军团造反，我慎重地考虑了第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军队是要加入“造反”的集团了，我应该怎么办？而且听说我们这一营也就要开差了。为着这一个问题，我有多少天陷于一种寝食难安的心境。考虑的结果，可以说构成了我一生中最大关键之一。这时，我把应该考虑的问题写下来，分析、判断，下结论——这是我向来处理问题的一贯作风。跟着军队北上打仗吗？打什么仗？原来是“造反”。我愿意造反吗？愿意附逆吗？良心回答我：“当然不愿。”不愿意造反，不愿意附逆，就是不愿意打，然而跟着军队北上，不打，成吗？事实回答我：“当然不成。”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字：走！我决心走，决心离开这腐败的烂队伍。明明知道走了以后，也是前途茫茫，但如果跟着他们一齐“造反”，将会把整个生命毁掉。我请了几天假，到了蚌埠，马上坐火车到上海，就写信给军队，说不能再回营。以后听见一个同学说：北京陆军部还有命令通缉我哩！我下这个决心，从今天看起来似乎是很平常，但在那个时候，确是一个很大的决心，并且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假使我不离开安武军，我一定被拖下水，当然不会到广东了。我所知道的：当时的四五十个同学中，只有我一人脱离了险恶的环境毅然地出走，而那些被拖下水的同学，一个个不是牺牲，就是淹没在腐败与不义的命运中了，真是可惜。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决心，尤其是一个应付非常事变的决心，是何等地重要！

督军团造反的结果，却引起了张勋的一幕滑稽魔术——拥护宣统复辟。经过段祺瑞的有名的“马厂誓师”，把这一幕魔术消灭了。国人以复辟之祸，系由解散国会而起，纷纷请求恢复国会，而段不以为然，主张重新召集临时参议院。头一个通电反对

的，就是孙总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省，也先后宣告自主。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孙总理同海军总长程璧光和国会议员率海军赴粤，树起护法运动的大纛。八月二十五日，国会议员开非常会议，议决组织军政府，并举孙总理为大元帅。

我这时已到上海，听到了孙总理率领海军南下护法的消息，就决心到广东去，参加革命的护法运动。

到广州后，见到广东的保定同学渐渐多了，大家联合起来推代表去谒见大元帅。接见我们的是一位参军。他向我们说，将先预备一个地方让我们住，以后陆续录用。于是我们就住在旅馆里等候，但是一等再等，都没有消息，吃饭也成问题，工作更谈不到。这时，因为有一个同学的介绍，我预备到云南讲武堂去工作，听说他们那里很欢迎保定学生。突然，又遇着征闽军事发生。福建督军李厚基，是督军团的中坚分子，孙总理在广东倡导护法，当然首先要解决他。在征闽的部队中，有滇军第四师第八旅，旅长是江西人伍毓瑞。我有几位保定同学，都是江西人，其中一位同学张善群劝我：“何必去云南，不如到福建打仗去。”因此，我取消了云南之行，同这几位江西同学，一同参加征闽的战役。

我干什么呢？在旅部挂了一个上尉差遣的名义，是一种额外人员。那个时候，我很表现了一点能力。记得有一次奉命运输子弹，由几百个挑夫挑，走旱路。我在当时，可以说是没有一点运输事务的经验，但长官派到了我，我就布置调度。自己穿一双草鞋，前头走到后头，后头走到前头，鼓励他们，招呼他们，勉慰他们。几百个挑夫，帖帖服服地到达目的地，没有逃跑一个人，没有遗失一箱子弹，总算把一个困难的任务完成了。长官曾嘉奖

我的能干。

当差遣没有多少固定工作，但我不甘清闲，就想起不如把旅部的勤务兵集合拢来，施以训练。最初招集三几个勤务兵，后来渐渐加到五六人，更渐渐加到四五十人。这些勤务兵，对上课，上操，都很感兴趣，自动愿意参加。他们受了训练后，不但知礼节，而且精神好。这在我也不过是一种兴趣，并没有其他想法。但是我们的旅长，看见我练兵有办法，就下令再凑合六七十人。编成一个旅司令部警卫队，派我当队长。这样，我就脱离上尉差遣的名义了。今天回想起来，我忝为一名军人，且曾统率大军，参加过大时代的抗日战争，这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起的呢？可以说，是从三个勤务兵练起的。

二、多次遇险

我任警卫队长不久，发生了一次事件。有一营军队是别人的，从旁的地方一路转徙到了汕头，我们的旅长想把他收编过来。事先曾派了一些人去接洽，又因为这一营军队的营长是安徽人，也曾经叫我从中斡旋。然而他们这般人，都是在外边烂场合里混惯了的“老油子”，对于我们旅长的意思，表面上象是接受了，曾经表示愿意改编，实际上，因为那般士兵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营长、连长并不能完全控制。也许营长、连长愿意改编，但是，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把这个意志贯彻到他们的部下。一天，我们的旅长以为是事先谈判好了的，就召集那一营军队在一个大空场里训话，实行收编。我带着一班士兵随旅长到那空场里。也许由于我们这位旅长不大善于言辞，他开头说的几句话，大概是：“过去的事（指餉项）我不负责，从今天起，即从改编

之日起，我一定负责。”他这几句话的语气，似乎是强调“不负责”，以致引起了绝大的误会。这时就有几个老班长站出来说话：“旅长改编我们，我们大家的欠饷，刚才旅长说不管。我们各连要举出代表来，要求发欠饷。旅长不管，谁管？旅长不发，谁发？”这样一个带有几分煽动性的质问，使全营的兵鼓噪起来了：“好！不发饷……”一种尖锐的愤怒的呼叫咆哮起来，我看见情形不对，立刻紧急处置，叫卫队赶快保护旅长离开。就在这一瞬间，乱兵就放起枪来。我回头一把抓住那营长，被他一掌推倒地下——事后才知道，他是好意，怕我站着受伤。——他也就卧倒。一阵连珠似的枪声，足足打了十分钟左右。我伏在地下，四周落满了子弹，泥土打起很高，到处都是弹痕，可是我的身上没有中着一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几百枝枪，在几十步内连续放了十分钟左右，我没有受伤。

这次事件以后不久，战事发动了，还是继续攻打福建。我们的阵地已移到离汕头不过几十里的黄冈，正开始激烈的战斗。傍晚时分，敌人从我们的左翼来威胁我们，象是用的迂回包围的战术。那时旅长觉得左翼非常重要而空虚，叫我带警卫队（等于一个连）掩护左翼作战。我带兵连夜出发，走了二三十里，到达我们的左翼，占领了一座小山头。这时敌人也已达到我们的左翼，占领山下的一个村庄。幸而我们先赶到了，占领山头。假使迟到一点，敌人就会把这山头占据，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双方战斗到天亮，敌人没有退。本来占领了这座山头，只要抵住敌人，也就可以达成了任务，但我一想，天亮了，敌人仍是不退，我实在不能忍耐，我们不进攻，敌人是不会退的。我就发了一个冲锋号，自己领着兵从山头冲下来，经过一道田冲，到达那村庄外面的一